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

——基于 CHIP 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肖小勇,黄 静,郭慧颖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 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教育; 职业教育; 农民工; 就业质量;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C 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2-0135-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zb.2019.02.016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农民工月收入 3 275 元,日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农民工占 37.3%,与雇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 64.9%。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偏低,存在工资水平低、工作时长、工作稳定性差、劳保福利缺失等问题^[1]。据统计,2017 年我国农民工 2.86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0.6%,农民工群体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力军之一。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不仅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与乡村振兴,也涉及城市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如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教育对就业的影响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受到关注,不少学者研究了教育对就业人员工资的影响,比如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2]、Mincer 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工资的回报率^[3]、Rubin 等认为教育对劳动者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等^[4]。现有文献重点关注的是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但收入只是就业质量的内容之一,教育对工作稳定性、工作时间、工作福利等方面的影响是否存在影响?进一步,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教育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是否存在代际差异?现有文献还未能较好的回答这些问题,这有待本文作进一步分析。

一、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从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一方面是从外部环境入手探讨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比如部分学者认为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安排是造成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5]。另一方面是从农民工个体视角探讨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逐渐减弱,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到关注^[1]。这些农

收稿日期:2018-06-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化背景下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价的传导及其风险评价研究”(71703049)。

作者简介:肖小勇(1987-),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

民工个体特征包括农民工的流动性(比如工作转换)^[6]、务工距离^[7]、社会资本(比如熟人关系等)^[8]等。

在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中,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就业人员工资。西奥多·W·舒尔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工资的差别主要是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别引起的,教育能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2]。Mincer 于 1974 提出“明瑟工资方程”从实证角度描述教育对工资的回报率^[3]。Rubin 等研究认为在计时工资制下受教育水平对劳动者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不少国内学者也探讨了教育对我国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普遍认为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比如,刘林平等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

二是强调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农民工工资提升上具有重要作用。屈小博认为培训提高了农民工工资水平,使其净收益提高了近 8.24%,明显高于教育回报率^[10]。刘万霞认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帮助农民工走向技术和管理岗位,从而提高工作待遇^[11]。王姣娜从职业发展不同阶段出发比较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劳动力回报的影响,认为前者能使毕业生在职业发展早期具有一定优势,而后者能使毕业生在职业发展后期的优势更明显^[12]。

上述关于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文献对本文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但已有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关注教育对农民工工资及待遇的影响,缺少关注教育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不仅包括工资及待遇,还包括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工作福利等方面;二是缺少关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尤其缺少关注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不同影响;三是缺少关注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家庭负担、新生事物吸收能力、所从事行业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比较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本文拟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 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不同类型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并比较教育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该数据库包含 760 户外来务工住户数据,有效样本 750 个。

2. 就业质量测算及描述

本文结合 Leschke 等^[13]、Erhel 等^[14]、李中建等^[7]等文献在构建就业质量指数的做法,并充分考虑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 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从四方面来测算农民工就业质量:①工资水平。衡量指标为平均月收入,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其他各种现金福利以及实物性伙食补贴和住房福利;②工作时间。衡量指标为月平均工作时间,由日平均工作时数和月平均工作天数共同得到;③工作稳定性。衡量指标为是否签订长期劳动合同;④劳保福利。衡量指标为是否享有各种劳保福利。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福利均为二值变量。参考李中建等^[7]运用 CHIP2013 数据测算就业质量的做法,本文经过采用标准化公式消除量纲、采用简单平均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等步骤,得到最终就业质量指数(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外来务工雇员的就业质量指数为 29.37。从工资水平来看,月平均收入为 3 158 元,标准差为 2 179,可见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不高且存在较大个体差异;从工作时间来看,月均工作时间为 225 小时;从工作稳定性来看,24%的外来务工人员签订了长期或固定合同;从工作福利来看,28%的外来务工人员享有工作福利。

表1 就业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工资水平	月收入/元	3 156.66	2 180.81
工作时间	月工作时间/小时	224.74	53.76
工作稳定性	已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1;无=0	0.24	0.43
工作福利	享有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或住房公积金=1;无=0	0.28	0.45
就业质量	取值为0~100	29.43	20.16

3. 解释变量选取及描述

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的描述。本文主要以最高学历、受教育年限和是职业教育三个变量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一是最高学历。调查问卷中关于最高学历的问题为:“所完成的最高学历是:①未上过学(包括识字班等非正规教育);②小学;③初中;④高中;⑤职高/技校;⑥中专;⑦大专;⑧大学本科;⑨研究生”。本文将最高学历处理为定序变量,如表2所示。最高学历的均值为3.31,即大多数农民工的学历都处于初中和高中阶段。二是受教育年限。由表2可知,受教育年限均值为9.56。这与最高学历的描述是相符的。三是职业教育。本文将技校、职高、高职、大专包括在职业教育内。将“接受过职高/技校/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赋值为1,其他为0。由表2可知,约15%的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教育。

其次,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及描述。①性别。均值为0.59,表明男性占被调查者约60%。②婚姻状况。均值为0.79,表明79%的农民工为已婚。③健康状况。均值为4.24,表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比较好。④工作经验。均值为9.54,表明样本中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平均约9~10年。⑤从事现职工作年限。该变量均值为5.33,表明被调查农民工从事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年限平均为5年限。⑥务工距离。均值为2.82,表明农民就业地点大多在县内。⑦工作获取方式。所调查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靠亲戚朋友介绍(占50%),其次是自己寻找(42%),公共部门介绍的比例约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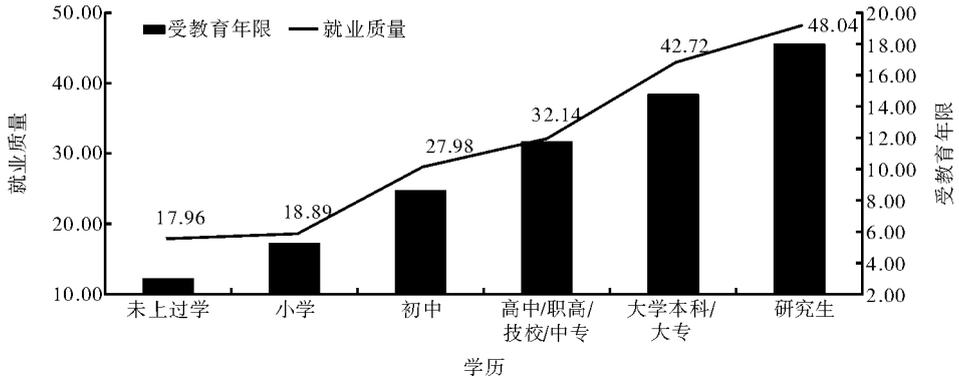
表2 解释变量选取及描述

变量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高学历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技校/中专=4;大学本科/大专=5;研究生=6	3.31	0.87
受教育年限	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9.55	2.88
职业教育	职高/技校/中专/大专=1;其他=0	0.15	0.36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9	0.49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丧偶或离异=0	0.79	0.41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1;不好=2;一般=3;好=4;非常好=5	4.24	0.72
工作经验	外出务工年限	9.54	7.32
现职工作年限	从事现职工作的年限	5.33	5.89
务工距离	村内=1;乡镇内他村=2;县内他镇=3;市内他县=4;省内他市=5;省外=6	2.82	1.37
工作获取方式			
是否自己寻找	自己寻找=1;否=0	0.42	0.49
是否亲戚朋友介绍	亲戚朋友介绍=1;否=0	0.50	0.50
是否公共部门介绍	公共部门介绍=1;否=0	0.06	0.23

4. 教育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上升。若没上过学或小学没毕业,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为17.26。当最高学历为小学或受教育年限为6年左右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增加至18.89。当最高学历为初中或受教育年限为9年左右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增加至27.98。当最高学历为高中、职高、技校或者中专,也即受教育年限为12年左右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增加至32.14。当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或专科,也即受教育年限为15年左右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增加至42.72。当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即受教育年限为18年左右时,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增加至48.04。

由此,本文初步认为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图 1 的描述性分析无法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也无法得出教育对就业质量的准确影响。为了准确刻画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下面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二者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间的代际差异。



注:样本中有一部分被调查者小学没读完,但在调查时仍填“未上过学”。因此,图形中横轴“未上过学”的受教育年限均值约为 3 年。

图 1 教育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

三、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

由于就业质量及其指标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为定距变量,本文采用 OLS 回归对这三个因变量进行分析。OLS 回归模型设定如式(1):

$$y_i = \beta_0 + \beta_1 education_i + \sum_{n=1}^N \alpha_n x_{in} + \epsilon_i \quad (1)$$

就业稳定性和工作福利为二值变量,本文采用 Probit 回归对这两个因变量进行分析。Probit 回归模型设定如式(2):

$$p(y=1|x) = \beta_0 + \beta_1 education_i + \sum_{n=1}^N \alpha_n x_{in} + \epsilon_i \quad (2)$$

式(1)和(2)中 *education* 为核心解释变量教育,在本文中主要指最高学历、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教育。 x_{in} 为其他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外出务工年限、从事现职工作年限、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 ϵ_i 为随机扰动项。 β_0 为常数项, β_1 为教育的系数, α_n 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

2. 学历和受教育年限对就业质量影响

根据式(1)和(2),下面分别以就业质量及其四个指标为因变量与教育等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和 Probit 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知,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的 R^2 值在 0.06~0.16 内, F 统计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同时模型 4 和模型 5 的 McFadden R^2 值在 0.10 附近,LR 统计量也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 1~5 整体拟合程度较高,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得到如下结论:

(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 3 中第 3 行表示的是学历层次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及标准误差。模型 1 中最高学历的系数为 7.04,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学历层次每增加一个等级,就业质量将上升 7.04。模型 2 和模型 3 中最高学历的系数为 401.11 和 -9.98,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学历层次每增加一个等级,月工资平均上涨 401.11 元,月工作时间平均减少 10 小时。模型 4 和模型 5 中最高学历的系数分别为 0.39 和 0.41,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学历层次每增加一个等级,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福利平均提高 39% 和 41%。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能够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能够率先实现非农

就业^[15-17]。第二,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农民工进入高收入行业,从而获得更高工资^[9,18]。比如刘林平认为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就业的比例。第三,教育有助于农民工从事技术岗位及管理工作^[9,19]。刘万霞认为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从事技术工人、班组长和中层领导以上职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农民工选择更好的岗位和从事技术型或管理型的工作,其工作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将得到提高。第四,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就业单位签订正式合同的可能性越大,就业质量就越有保障^[12]。

表 3 学历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时间	工作稳定性	工作福利
最高学历	7.036*** (0.955)	401.109*** (108.893)	-9.989*** (2.605)	0.392*** (0.073)	0.408*** (0.071)
性别	1.708 (1.615)	1 045.827*** (184.127)	9.360** (4.405)	0.144 (0.123)	0.047 (0.117)
婚姻状况	3.193 (2.114)	65.845 (241.055)	1.456 (5.766)	0.235 (0.162)	0.143 (0.154)
健康状况	2.438** (1.079)	108.101 (123.005)	6.185** (2.942)	0.215*** (0.084)	0.161** (0.079)
外出务工年限	0.172 (0.127)	18.074 (14.424)	-0.549* (0.345)	0.001 (0.009)	0.016* (0.009)
从事现职工作年限	0.345** (0.168)	30.750* (19.184)	-0.312 (0.459)	0.027** (0.012)	0.013 (0.011)
务工距离	-1.202** (0.591)	36.258 (67.383)	-2.936* (1.612)	-0.047 (0.045)	-0.119*** (0.044)
是否亲戚朋友介绍	-2.124 (1.663)	-317.270* (189.557)	10.905** (4.534)	-0.004 (0.127)	-0.118 (0.121)
是否公共部门介绍	18.786*** (3.943)	277.601 (449.593)	-4.373 (10.755)	1.057*** (0.279)	1.028*** (0.289)
R ² 或 McFadden R ²	0.168	0.103	0.066	0.103	0.104
F 统计量	12.833***	7.318***	4.488***	—	—
LR 统计量	—	—	—	66.756***	74.33***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OLS回归模型使用R²,Probit回归模型使用McFadden R²;把“是否自己寻找”作为工作获取方式的参照组。

为了考察结论的稳健型,保持因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不变,以受教育年限替代最高学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再次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6中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为2.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就业质量将上升2.32。模型7和模型8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117.97和-3.6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月工资平均上涨117.97元,月工作时间平均减少3.61小时。模型9和模型10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分别为0.13和0.1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福利平均提高13%和15%。表4的结论和表3的结论是相符的。一般的,提升一个学历层次需要3年的时间,因此,表3中最高学历的系数是表4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的3倍。由此可见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表 4 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工作时间	工作稳定性	工作福利
受教育年限	2.318*** (0.288)	117.966*** (33.155)	-3.610*** (0.782)	0.129*** (0.023)	0.145*** (0.022)
R ² 或 McFadden R ²	0.182	0.102	0.074	0.107	0.117
F 统计量	14.091***	7.181***	5.081***	—	—
LR 统计量	—	—	—	69.963***	84.177***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OLS回归模型使用R²,Probit回归模型使用McFadden R²;把“是否自己寻找”作为工作获取方式的参照组;估计模型6-模型10时包含了其他解释变量,但为节省篇幅,本表没有列出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

(2)健康状况、从事现职工作年限、务工距离、工作获取方式等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由表3可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越好就业质量越高,体现为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工资、工作稳定性和福利待遇都将提高。该观点与 Thomas 等、秦立健等的结论较为接近^[20-21]。健康将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劳动供给时间,进而影响工资待遇及工作稳定性。从事现职工作年限的增加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这是因为随着从事现职工作年限的增加,农民工对就业环境更熟悉、技术更高,效率也更高,这些都对谋求更高工资、更少工作时间和更长期的工作合同有帮助。务工距离越远将降低农民工就业质量。这进一步证实了李中建和袁璐璐的研究结论,即当务工距离囿于县内时,务工距离的增加会引起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降低,尤其体现在提高务工距离将降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和劳保福利^[7]。这可能与农民工家庭形态差异有关。与自己寻找工作相比,公共部门介绍工作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这表明政府等公共部门组织的职业介绍、就业服务站、人才交流会等对农民工就业作用明显。

3. 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职业教育影响的主要群体之一是农民工^[5]。本部分主要考察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为了区别不同阶段职业教育的影响,结合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本文将最高学历选项里的职高、技校和中专归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将普通高中归为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将大专归为大学阶段职业教育,将大学本科归为大学阶段普通教育。

表5报告了各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因篇幅限制,本部分省略了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仅将教育的五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5。表5中模型11~模型15的 R^2 值在0.09~0.12内, F 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高,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得到如下结论:

(1)接受职业教育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表5中未分阶段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10.4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高10.40。农村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有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22]。正规教育能够提高文化素质,而技能培训能够提高技术素质。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正规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外出务工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23]。技能培训更能直接和有效的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24]。因此,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25]。

表5 各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未分阶段 职业教育	高中阶段		大学阶段	
		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系数	10.401*** (2.322)	4.344 (3.353)	1.417 (2.306)	13.322*** (2.949)	20.611*** (6.054)
R^2	0.119	0.092	0.089	0.120	0.107
F 统计量	8.609***	6.367***	6.208***	8.649***	7.576***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2)各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一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高于该阶段的普通教育。解释如下: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如职高、技校和中专等能够训练农民工工作技能,提高效率。在普通教育较低阶段,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能够更快适应工作环境、更好地满足工作单位要求,因而比普通高中教育毕业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22];二是大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低于大学阶段普通教育。大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13.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学阶段的普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20.6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换句话说,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比最高学历为大学专科的农民工高7.29。解释如下:接受职业教育可在短期内提高就业机会,但从长期来看,降低了获得更高质量工作的可能性^[26]。高职位、高收入要求劳动者具备高素质,这对

于仅仅获得技能培训的劳动者来说比较困难。王姣娜认为在就业初期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好于普通教育,但是在后期普通教育毕业生的状况将好转并反超^[12]。

4. 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

下面比较新生代农民工(1980 年以后出生)和老一代农民工(1980 年以前出生)之间教育对其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本文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为 340 个,老一代农民工的样本数为 410 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指数为 31,而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为 28。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 年,而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年。新生代农民工中约 26.2%接受过职业教育,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 5.3%接受过职业教育。表 6 中以就业质量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最高学历、受教育年限和职业教育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保持其他解释变量与表 3 一致。模型 16~模型 21 的 R^2 值在 0.07~0.23 内, F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 19~模型 24 的整体拟合程度较高,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得到如下结论:

表 6 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回归结果的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最高学历	7.662*** (1.453)	—	—	5.605*** (1.430)	—	—
受教育年限	—	2.528*** (0.464)	—	—	2.062*** (0.416)	—
职业教育	—	—	8.945*** (2.765)	—	—	8.101* (4.849)
性别	-1.714 (2.408)	-1.652 (2.401)	-2.557 (2.479)	4.013* (2.204)	3.764* (2.178)	5.067** (2.227)
婚姻状况	1.369 (2.504)	1.261 (2.495)	1.113 (2.587)	12.865* (7.285)	13.028* (7.197)	12.599* (7.433)
健康状况	4.698*** (1.945)	4.654*** (1.939)	4.875*** (2.013)	1.714 (1.315)	1.756 (1.299)	2.318* (1.331)
外出务工年限	0.154 (0.337)	0.108 (0.336)	0.081 (0.348)	0.179 (0.144)	0.186 (0.142)	0.207 (0.146)
从事现职 工作年限	0.967*** (0.407)	1.019*** (0.407)	0.879** (0.421)	0.182 (0.185)	0.135 (0.183)	0.156 (0.188)
务工距离	-2.714*** (0.888)	-2.958*** (0.885)	-2.717*** (0.919)	-0.240 (0.815)	-0.476 (0.810)	0.045 (0.828)
是否亲戚 朋友介绍	-7.249*** (2.623)	-7.580*** (2.599)	-9.063*** (2.672)	-0.467 (2.226)	0.033 (2.211)	-1.275 (2.258)
是否公共 部门介绍	16.626*** (5.231)	16.084*** (5.223)	16.637*** (5.433)	20.068*** (5.959)	19.874*** (5.888)	21.498*** (6.080)
R^2	0.226	0.231	0.174	0.109	0.134	0.074
F 统计量	9.292***	9.532***	6.971***	5.441***	6.548***	3.902***
样本量	340	410				

注:***、**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把“是否自己寻找”作为工作获取方式的参照组。

(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重要。模型 16 和模型 19 中最高学历的系数分别为 7.66 和 5.61,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学历层次每增加一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上升的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 2.05,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溢价更高。模型 17 和模型 20 中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分别为 2.53 和 2.06,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上升的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 0.47。模型 18 中职业教育的系数为 8.95,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高 8.95。模型 21 中职业教育的系数为 8.10,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接受过职业教育的老一代农民工比没接受过职业教育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高

8.10. 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重要这一观点得到相关文献支持^[27-28]。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时对于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需求和重视比老一代有所提高,老一代农民工较多选择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向餐饮、娱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拓展。在餐饮、娱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中,受教育程度越高,接收新生事物能力越强,工作待遇及福利就能得到提升。

(2)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从事现职工作年限、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从表6中可以看出:1)老一代农民工中性别为男性将显著提高就业质量,而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老一代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从事建筑、制造业等体力型劳动。在从事体力型劳动时,男性工资及福利待遇比女性高。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较少选择体力型,因此,就业质量上性别差异并不明显。2)老一代农民工中婚姻状况为已婚将显著提高就业质量,而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老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大多在35~55岁之间,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尤其是在老人得病和小孩上学的时期家庭负担较重,老一代农民工在这个阶段倾向于从事一些辛苦、稳当且赚钱多的工作来养家。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轻,是否结婚对其工资、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大。3)健康状况、从事现职工作年限、务工距离和工作为亲戚朋友介绍等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

(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无论是学历的提高,还是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都将提高工资水平、降低工作时间、提升工作稳定性和改善劳保福利。

(2)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各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该差异主要体现在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高于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而大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低于大学阶段普通教育。

(3)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重要。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接受职业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

(4)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由此得出政策启示:政府部门需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首先,逐步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通过法律保障高中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村适龄受教育群体的学历层次和受教育年限,提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其次,重视职业教育。探索和创新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职业标准等相对接,培养出技术过硬的专门技术人才;鼓励各级职业教育机构重点面向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鼓励用工单位开展在职培训。最后,重点关注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作为未来劳动力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教育的意义更为重大。

参 考 文 献

- [1] 高文书.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8-34.
- [2]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 [3] MINCER J.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 [4] RUBIN D K,PERLOFF J M.Who works for piece rates and wh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3,75(4):

1036-1043.

- [5] 杜鹰.走出乡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 [6] 明娟,王明亮.工作转换能否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J].中国软科学,2015(12):49-62.
- [7] 李中建,袁璐璐.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6):70-83.
- [8] 张昱,杨彩云.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5):9-20.
- [9] 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学研究,2007(6):114-137.
- [10] 屈小博.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贡献的净效应——基于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13(8):55-64.
- [11] 刘万霞.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3(5):64-75.
- [12] 王姣娜.教育类型、职业生涯与劳动力市场回报[J].社会发展研究,2016(1):201-218.
- [13] LESCHKE J, WATT A.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 118(1):1-31.
- [14] ERHEL C, GUERGOATLARIVIERE M. Trends in job quality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debt crisis (2007-2012): a comparative approach for the EU[J]. Psychopharmacology, 2015, 232(19):3563-3572.
- [15] MICHELA M S, ANDREA S, STEFANO T, et al. Handbook o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icators[R]. Paris: OECD, 2008.
- [16] 刘精明. 向非农职业流动: 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6):1-18.
- [17] 赵力涛. 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3):98-109.
- [18] 刘士杰.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 OLS 回归的实证分析[J]. 人口学刊, 2011(5):16-24.
- [19] 符平,唐有财,江立华. 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6):75-82.
- [20] THOMAS D, STRAUSS J. Health and wages: evidence on men and women in urban Brazil[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7, 77(1):159-185.
- [21] 秦立建,秦雪征,蒋中一. 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30(8):38-45.
- [22] 展进涛,黄宏伟.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 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 ——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6(2):55-67.
- [23] 王德文,蔡昉,张国庆.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 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 经济学(季刊), 2008, 7(4):1131-1148.
- [24] 王建.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 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1):113-126.
- [25] 魏万青. 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2):33-43.
- [26] SHAVIT Y, MULLER 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550.
- [27] 黄祖辉,刘雅萍.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10):51-59, 111.
- [28] 王玉峰,陈宗慧,郭瑞英. 农民工工作价值现代际差异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12):32-41, 110.

(责任编辑:陈万红)